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一次
(2009年)资助社会科学出版项目



两汉交趾与益州对外关系研究

——以若干物质文化交流为主

周永卫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大汉帝国的盛世雄风，远播域外。对异域文化大规模的吸收，对中国文化远距离的传播，是汉朝成为盛世的重要原因。在以南越王墓为代表的岭南汉墓中，发现的大量具有异域文化因素的文物，显露出两汉时期岭南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冰山一角。通过对两汉岭南和西南地区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境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中国遗物的研究，对我们重新认识岭南和西南地区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文化交流上的沟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论述了汉代岭南地区生产和使用本土香料的情况，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论述了汉代岭南和西南地区还是犀、象、金、银的重要产地，而这些产品同时也是中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具有一定新意。对西汉时期巴蜀商人的地位和特点有比较深入的分析，是本书的创新之处。论著资料丰富，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受到诸多专家的好评。

本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发掘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对于揭示广州和岭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 要

本论著运用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试图通过以香料、犀、象、金、银等为内容的物质文化交流活动，研究两汉时期以交趾和益州为中心的中外交往关系，从而揭示岭南和西南地区在两汉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南越王墓出土的列瓣纹银盒，其形制和风格与同一时期石寨山墓出土的2件铜盒完全一致，都是从波斯传来的。云南是铜鼓和羽人船纹的发源地，南越王墓中的羽人船纹铜提筒，反映出南越国与云南地区的密切联系。石寨山墓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和大量的海贝，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铜盒和银盒，甚至包括临淄齐王墓中的银盒，都与蜀商的活动有关。不仅石寨山铜盒的“舶来”路线是由滇缅印道而来，南越王墓银盒和临淄齐王墓银盒由滇缅印道或交趾陆道“舶来”的可能性也相当大。在当时，中国南方地区与印度的对外交往都是以中南半岛为桥梁，走的是陆路，或内河水路，而不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的海路。

两汉是中国对外交往日渐频繁的时期，也是香料在中国社会开始受到重视的时期。香料在两汉对外关系史上，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陈竺同、王鞠侯、陈连庆、吴焯等对此都有深入研究。这四位学者关于汉代香料的论述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汉代输入中国的香料问题，一是香料与佛教的关系问题。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对香料在汉武帝以前的使用问题，汉代南方所产的香料问题，以及汉代香料的出口问题等做一些粗浅的论述。汉代所使用的香料，虽然有一些是从西域和南海等地进口的，但更多的是我国自己生产的，特别是南方地区生产的。岭南地区是香料的重要产地，也是消费和使用香料最多的地方之一，又是香料贸易异常活跃的地方。

两汉时期，犀牛的生存范围和活动区域进一步缩小到岭南和西南一带。频繁战争，加剧了对犀甲的需求，也加速了犀牛数量的锐减。我国对犀角的利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时间愈后，愈受珍视和重视，作用和地位也愈是突出。犀角在汉代还被当作药材，亦成为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贡赋之一。犀牛和犀角作为珍贵礼品，在外交活动中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两汉时期，外国遣使朝贡活动中，向汉廷贡献犀牛或犀角的记载共有4次。这4次贡献，不仅写进有关的列传中，而且载入本纪之中，足见史家已把这些贡献活动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到了两汉时期，大象的栖息地与犀牛一样，逐渐缩小至岭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大象的性格较为温顺，早已被用来为人类服务。汉代还曾经风靡过一种称做“象舞”的百戏。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民间的“象舞”活动也十分活跃。象与佛教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两汉时期，犀、象以及犀角、象牙是异域蛮夷朝贡贸易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沿海路来华，赠送的三样礼物中就有犀角和象牙，这绝非偶然。大象在东南亚和印度地区，较中国的岭南和西南地区更为普遍。藤田丰八认为驯象、象用于战争均始于印度，后及于受其文化影响之南海诸国和中国，是很有道理的。

两汉时期的交趾和益州地区，也是金银的重要产地，金银在汉代的中外交往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汉代，金银作为贵金属是统治阶级崇尚和追求的目标。北方地区出土的汉代的金银器虽然多于南方，但金银产地自先秦以来主要在南方。在东汉，岭南的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都是出产黄金的。东汉时期并入永昌郡的哀牢人是一个崇尚金银的民族。犍为郡的朱提县作为重要的白银产地，在新莽时期还是著名的银币生产基地。两汉的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地区，不仅在金银矿的开采和冶炼方面全国领先，而且在金银器的制作和鑲金银工艺水平方面也独领风骚。

岭南地区在南朝时期一度成为以金银为本位的特殊地区，绝非偶然，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古代的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特别是岭南地区有着长期而又频繁的经贸往来。黄金和丝绸一起成为与南海诸国交往的媒介。这进一步刺激了中南半岛的金银矿的开采和金银的使用。与汉朝相比，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对金银的使用更为普遍，也更为重视。2世纪末在中南半岛上出现的林邑和扶南这两个国家都有崇尚和使用金银的传统。

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不仅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

岭南和西南地区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成为蜀商非法贸易的乐土。司马迁把“巴蜀殷富”的原因归结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犍僮、牦牛”，其见解是非常精辟的。有学者认为南印度迈索尔出土的公元前138年的古汉钱，可以与《汉书·地理志》王莽于元始间与黄支国海上交通之记录相互印证。笔者以为，此枚汉钱更有可能是从云南、缅甸传过去的。这枚铜钱与坦焦尔出土的三珠钱都是武帝初年铸造。武帝登基伊始，实际权力掌握在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手中，也正值私人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西南地区的蜀商最为活跃。这枚铜钱似应与蜀地的走私商人有关，正与《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相印证。汉武帝消灭南越国，平定西南夷，“巴蜀殷富”的基础轰然坍塌，蜀商的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荡然无存。“程（郑）、卓（王孙）既衰”，辉煌不再。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数百年的巴蜀商人集团从此黯然失色。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从此微不足道了。

到了东汉，从南方入境的外国使者、商人和佛教徒人数日渐增多。益州刺史部的永昌郡和交州刺史部的交趾郡成为胡商和佛教徒云集的地方。一般认为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是伪造的，但滇缅印道的正式开通，恰恰正是明帝时期，这一事实，许多人似乎未曾注意。大秦商人大举涌入印度之时，正是哀牢归附，东汉正式打通滇缅印道路之际。大秦与汉朝的最早的直接交往是以掸国为桥梁，以“海西幻人”为媒介，而“海西幻人”最早是从滇缅印道经永昌来华的。

番禺是南越国的都城所在，是西汉前期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徐闻是西汉后期“汉使”出使海外的始发港之一。他们在汉代中

外关系史上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汉代在徐闻设置的“左右候官”并非海外贸易官员，而是候官官署。无论是两汉的史书中，还是出土的大批汉简中，“候官”只有两个含义，其一指郡都尉府所属的下一级组织；其二指候官官署，也就是候官治所。徐闻的左右两个候官，堆积了许多货物，进行商贸活动，正是其军需职能的延伸。

两汉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时期。以交趾和益州这两个刺史部为桥梁，以缅甸道、南海道、交趾陆道为主要途径的汉代对外交往，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汉，活跃的蜀商，通过缅甸道，与印度发生了贸易往来；无名的汉使，远渡南海，到达黄支。到东汉，胡商、胡僧纷纷来到中国，进而导致了南方诸道的繁荣。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佛教，其传播的途径，也与南方诸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香料、象、金与佛教关系密切，也与中国与印度、罗马之间的贸易有关，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和西南地区。

关键词：香料；犀象；金银；蜀商；中外物质文化交流

目 录

摘 要	(1)
引 言	(1)
两汉交趾和益州对外关系研究的学术史	(2)
交趾与益州的密切关系	(7)
本课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围	(9)

第一章 银盒与铜盒

云南汉墓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	(13)
滇文化对南越国的影响	(15)
滇池地区频繁的对外交往	(17)

第二章 香料

汉代香料使用的三个阶段·····	(24)
南方生产的本土香料·····	(30)
汉代输入的异域香料·····	(45)
香料在南方的使用更为广泛·····	(50)
香料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59)

第三章 犀象

交州、益州是犀牛的产地·····	(64)
犀牛、犀角在外交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67)
交州、益州是大象的产地·····	(74)
大象和象牙在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75)
象与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80)

第四章 金银

两汉对金银的重视·····	(86)
交州、益州是金银的主要产地·····	(89)
岭南地区金银器的使用·····	(96)

金银在东南亚、南亚的使用更为普遍	(97)
金银成为岭南和西南地区商品流通的重要媒介	(100)

第五章 蜀商·胡商·胡僧

蜀商	(104)
蜀商在西汉前期异常活跃	(105)
蜀商在南方的边境走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08)
南印度出土的汉代铜钱似应与蜀商有关	(112)
胡商·胡僧	(114)
月氏人与西南地区的氐、羌关系密切	(116)
滇缅印道开通早于南海道	(118)
公元 120 年海西幻人来华是中国与罗马帝国交往的最早记录	(120)
东汉后期南海道日渐繁荣	(122)

第六章 番禺、徐闻与海外交通

番禺	(125)
番禺与西汉前期的十大名都	(126)
十都中唯一的海港和对外贸易口岸城市	(130)

特色鲜明的区域中心城市	(132)
西汉后期以后番禺地位的变迁	(133)
徐闻	(135)
合浦郡发达而活跃的珍珠业	(136)
徐闻的左右候官并非海外贸易官员	(139)
汉代的徐闻港	(140)
汉代徐闻与南海交通	(142)
结语	(147)
主要参考文献	(153)
附录1 汉代出土熏炉统计表	(173)
附录2 汉代南海进贡表	(186)
附录3 汉代南方地区对外交往大事年表	(187)
附录4 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	(190)
后记(一)	(191)
后记(二)	(193)

引言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选题，选择它，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这是一个富有魅力的选题，选择它，能领略挑战的乐趣。

我对汉代中外关系问题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就知道余英时先生的名著《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一书，但由于该书没有中文版^①，一直无缘读到。1999年，有幸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在系资料室竟发现了余先生的大作。在导师张荣芳教授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我把这部十余万字的著作译成了中文，获益匪浅。该书围绕汉代的对外贸易与扩张问题，从多角度全面深入探讨了汉代的对外关系，杨联陞先生在序言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的广度与深度使之成为这一领域中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对

① 笔者按：此书现已有中译本。请参阅鄒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笔者认为，中译本以《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为名，可能更符合合作者余英时先生本意，因为这部1967年出版的英文专著的封面上就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字样的汉文书名。

理解中国历史做出了无形的贡献。”^② 书中所引文献达 330 余种之多，其中中文 160 余种，西文 130 余种，日文 40 余种。余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史料功底，对考古新发现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南越王墓博物馆，阅读《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我发现南越王墓中的许多文物竟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所出土的文物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且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子。后来拜读了马雍先生《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一文，文中说到“交趾在东汉时为南方对外通商口岸，其地位与敦煌相等，不过一在陆路，一在海路而已。”^③ 我深受启发，最终选择以《两汉交趾和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在我看来，交趾海路和益州陆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

两汉交趾和益州对外关系研究的学术史

汉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时期，两汉对外关系研究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向达《中西交通史》（1934），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卷 195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1984）等通史性对外关系著作中，对汉代中外关系都有系统精辟的论述。其中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至今是研究汉代对外关系的重要著作。方豪的《中西交通史》中有关汉代的内容，对南方海路和西南陆路的对外交往颇多

② Yu, 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p. v. (Forewor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

③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第 53-54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论述,涉及中印关系、中国与罗马的关系、以及公元前后希腊罗马作家对中国的论述等内容。其它著作对汉代南方海陆诸道的对外交往论述不多。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④是迄今为止,继余英时著作之后,第二部研究两汉对外关系的专著。但其研究重点和余著一样也在西域地区,对南方地区对外交往几乎很少涉及。刘欣如的《公元1至6世纪中国与印度的商业和文化交流》(英文版)一书,对中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颇为重视,但其关注的重点也在西域地区。^⑤

季羨林先生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⑥,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路线分为南海道、缅甸道、安南道、西域道、西藏道等五道。这也正好概括出汉代对外关系的主要途径。这五道之中,除西域道外,其余四道都与交趾和益州有关。由于西藏道所知汉代文献和考古材料非常有限,这里就仅限于南海、缅甸、交趾(安南)三道了。以交趾和益州为桥梁,以上述三道为主要途径的汉代对外交往,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两汉时期,南海路蓬勃兴起,并载入正史之中,而缅甸路也达到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二十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研究。法国学者伯希和1904年的《交广印度两道考》^⑦对安南(交趾)道、缅甸道、南海道的具体走向和路线,做过系统详细的考证。所考地名虽以唐代为主,但对研究汉代对外交通,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④ 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⑤ Liu, Xinru, Early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First - Sixth Centuries A. 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⑥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三联书店,1982年。

⑦ 《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年。

关于汉代的南海道，法国的费邛、日本的藤田丰八、我国的冯承钧、张星烺、岑仲勉、许云樵、苏继庠、韩振华、劳干、韩槐准、谭彼岸、周连宽、张荣芳等学者，对《汉书·地理志》中的汉使航程问题，及所至国家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考证。关于汉使航行最远所达的黄支国的地望，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派意见，大多数学者主张在印度东海岸，只有劳干、韩槐准、谭彼岸、周连宽、张荣芳等主张在东南亚地区^⑧。近年来，谢光、黎道纲（泰籍华裔）等又对汉使所至的都元国、邑卢没国和谶离国的具体位置结合考古发现材料，进行了新的考证，得出了新的结论^⑨。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1996）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论文汇编，多有创见。孙机、徐苹芳、林梅村等对我国境内出土的“舶来品”及其所涉及的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结论和成果值得重视^⑩。此外，海外学者王赓武的《南海贸易》（英文版 1958，中译本 1988）对古代南海贸易的研究堪称力作。

⑧ 费邛《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藤田丰八《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中华书局，1977年；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载《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许云樵《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南洋学报》1948年第5卷第2期；苏继庠《汉书地理志已程不即锡南说》，《南洋学报》1948年第5卷第2期；韩振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57年第2期；劳干《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韩槐准《旧柔佛之研究》，《南洋学报》1948年第5卷第2期；谭彼岸《汉代与南海黄支国的交通》，《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2期；周连宽、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1980年。

⑨ 谢光《泰国与东南亚古代史地丛考》，华侨出版社，1997年；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

⑩ 孙机《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1995年新1期；徐苹芳《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林梅村《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中译本1984）将沟通南海的东西海上路线，概括为“陶瓷之路”，颇具新意。

关于汉代的缅甸道，夏光南、方国瑜、饶宗颐、严耕望、桑秀云、陈炎、陈茜、张毅、任乃强等学者主要围绕此道在中国境内的走向、名称、贸易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⑪。江玉祥等主编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1990；第二辑1995）收集了已发表的重要论文及新作30余篇，并附有相关参考文献目录，是对此前“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全面总结。蓝勇的《南方丝绸之路》（1992）是近年来第一部系统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学术专著。童恩正、张增祺等结合西南地区的考古文物，对此道上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⑫

综观一个世纪以来，汉代南方对外交往研究，成果丰富，但也留下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余地：

（1）相当多的论著把研究重点集中在交通路线和地名的考证上，中外关系史成为名副其实的狭义的中外交通史，对丰富多彩的汉代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象谢弗《唐代的

⑪ 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方国瑜《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东南亚》1984年第4期；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选堂集林·史林》（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严耕望《汉晋时代滇越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1976年；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41册；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陈炎《古代中缅文化交流》，《世界历史》1979年第6期；陈炎《中国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文献》1986年第3期；张毅《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80）。

⑫ 童恩正《试谈古代文明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第9期；《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地区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外来文明》那样的力作。早在 30 年代陈竺同先生就撰写了《汉魏以来海外输入奇香考》、《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南洋输入生产品的史考》等系列论文，堪称研究汉代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开创之作。可惜在他之后，除了季羨林先生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初步研究》、饶宗颐先生的《蜀布与 cinapatta》等论著外，鲜有力作出现。

(2) 大多数论著都从宏观研究着手，中观和微观研究不足。所使用的材料仅限于正史和《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对许多重要史料重视不够，如《急就篇》、《淮南子》、《说文解字》、《博物志》、《西京杂记》、《三辅黄图》、《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正如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指出，我国学者研究汉代对外关系，主要依据张星娘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耿昇翻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二书的材料，难免有许多局限性。^⑬

(3) 解放后，岭南、西南地区汉代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江川李家山汉墓群、昆明羊甫头汉墓、贵县罗泊湾汉墓、合浦汉墓、广州汉墓、南越王墓、南越王宫苑遗址等大批考古成果，大大丰富了我们这一区域对外交往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为深入研究汉代对外关系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相比之下，对这一区域出土的汉代文物与中外交往的关系的研究论著，显得比较少。

值得庆幸的是，汉代对外关系研究中重西域轻南方，“北热南冷”的现象已开始有所改变。邢义田在《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

⑬ 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检讨（1985-95）》，《汉学研究》1997年第15卷第1期。